

#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从“投资驱动”转向“创新驱动”

——专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刘俏



刘俏,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,中国资本市场学会副会长兼市场微观结构专委会主任委员,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,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五任院长(2017年1月-2026年4月),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获得者(2013年),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(2014年),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(2023年)。他是中国证监会第十七届审委会委员,“十四五”“十五五”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,国家统计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,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,在公司金融、实证资产定价、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、碳中和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。

证券时报记者 韩忠楠

在传统要素驱动边际效应递减的背景下,全要素生产率,即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体效率,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核心变量。提升全要素生产率,归根结底要靠科技创新与制度改革的协同发力。2025年,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.8%,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国家平均水平,这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注入了新动能。

进入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,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,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否推动经济实现从“投入驱动”到“效率跃升”的关键跨越,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韧性和民生福祉的改善。围绕上述话题,近日,证券时报“人民财讯·大观”栏目特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刘俏,对“十四五”时期研发投入的真实成效、全要素生产率的走势特征,以及“十五五”时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所需的改革路径进行深度解析。

**2.8%**

2025年,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.8%,这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注入了新动能。

**10%**

“十四五”时期,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%。

**1.8%**

多方测算显示,过去五年,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约为1.8%。

**11.3年**

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提升至11.3年,人力资本的积累让劳动要素的质量实现了跃升。

**40%**

要支撑4.5%左右的经济增速,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拉动力,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需要提升至40%左右,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。

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,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路径,也是还原经济增长“以人民为中心”本质的关键。

## 复盘“十四五”:研发投入强度2.8%,离创新型国家还有多远?

证券时报记者:随着“十四五”收官,多项研发投入数据引发广泛关注——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;“十四五”时期,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%,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0.44个百分点。您认为,这些数据是否表明,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?

刘俏:从数据来看,我国研发投入的绝对规模已位居全球第二,2.8%的研发投入强度也超过了OECD国家平均水平,这充分说明“十四五”时期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力度实现了质的提升,是科技创新实力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标志。但研发强度只是创新的“输入指标”,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创新型国家,还要看

它“产出了什么”,以及“如何产出”。更关键的是要看研发的效率、结构以及成果转化能力。

我国当前研发结构中,基础研究占比仍有短板。数据显示,我国基础研究占比长期处于6%-7%,而典型的创新型国家,这一数据普遍在15%以上。这意味着,我国在核心技术、原创性成果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。

人工智能大模型等领域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。我国在“1到N”的技术转化和产业化环节,凭借规模优势和产业配套能力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的齐头并进,但如果面临外部技术封锁,需要构建独立创新生态链时,基础研究的短板就会凸显。基于此,即便研发投入规模实现突破,我们仍需持续加大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投入,这是向创新型国家迈进的核心抓手。

证券时报记者:能否用通俗语言解释什么

是全要素生产率?研发经费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什么关系?

刘俏:简单来说,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生产要素的“使用效率”,是扣除了劳动力、资本等传统要素投入后,经济增长中额外的贡献部分。打个比方,同样一个工人、一台机器,过去只能生产1个单位的产品,现在能生产5个单位,这多出来的4个单位,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成果,其核心来源是技术进步、管理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。

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,其来源主要有两方面:一是技术革命、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;二是资源配置效率优化释放的增长潜力。研发投入正是技术进步的核心支撑。

证券时报记者:“十四五”时期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怎样的变化?科技创新在多大程度上对冲了传统要素投入下降的压力?

刘俏:从测算结果来看,“十四五”时期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稳步提升的趋势,这是多方测算的共识,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机构,最新的数据都印证了这一变化。虽然具体的数值因方法论、要素统计口径存在差异,但整体来看过去五年,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约为1.8%。

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,本质上是中国经济从“规模驱动、投资驱动”向“创新驱动、效率驱动”转型的直接体现。虽然人口红利消退让传统劳动要素对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,但我们通过人口质量的提升对冲了影响,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提升至11.3年,人力资本的积累让劳动要素的质量实现了跃升。同时,大规模研发投入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,以及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,也成为对冲传统要素压力的核心力量。

## 民生视角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,到底改变了什么?

证券时报记者:有观点认为,“十五五”时期支撑经济合理增长速度必须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,它的变化会对居民就业、收入、社会福利等民生领域产生哪些影响?

刘俏: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,不是单纯的经济指标变化,而是会渗透到生产、分配、交换、消费的各个环节,直接影响民生福祉,这也是高质量发展发展的核心要义。

从就业的视角来看,效率提升会推动产业升级,催生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岗位,比如人工智能、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发展,会创造大量高质量、高质量的就业岗位,同时推动传统行业的就业结构优化,让劳动者从“体力型”向“技能型”转变。从社会福利的视角来看,效率提升会让社会财富总量增加,政府有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公共服务,提升公共服务

的供给能力和均等化水平,居民收入增加后,也能享受更多的高端消费、服务消费,获得感和幸福感会显著提升。

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,经济增长只能依靠“垒资源、堆投入”的粗放模式,不仅会导致产能过剩、资源浪费,还会让居民收入增长放缓、就业质量下降,社会福利的提升也会缺乏可持续的支撑。所以,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,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路径,也是还原经济增长“以人民为中心”本质的关键。

证券时报记者: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民生改善是正向的因果关系,还是相互促进的关系?

刘俏:从理论逻辑来看,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因,民生改善是果,效率提升带来经济高质量增长,进而推动就业、收入、福利的改善。但从实践来看,二者是相互促进、良性循环的关系。

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让居民收入增加、消费升级,而新的消费需求又会牵引新的供给,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,提升创新能力,进一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;同时,民生改善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,比如教育水平提高、健康保障完善,会让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得以提升,成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重要人力资本支撑。

比如,哈尔滨通过发展文旅产业,提升服务业质量,实现了人口净流入,居民收入增加、消费活力提升,而消费需求的升级又推动当地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,提升服务效率,这就是民生改善与效率提升相互促进的典型案例。所以说,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最终要落到民生改善上,而民生改善又会为效率提升提供持续的动力。

证券时报记者:当前国内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,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看似不显著,如

何看待这一现象?

刘俏:服务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看似不显著,核心原因是服务业的效率提升是“慢变量”,与基建、制造业等领域的“立竿见影”不同,服务业的效率提升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培育。但服务业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领域,尤其是传统服务业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,蕴藏着巨大的效率提升潜力。

哈尔滨、云南等地区的文旅经济发展,看似短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明显,但从长期来看,当地通过打造品牌、优化服务、集聚人口,推动了服务业的规模化、专业化发展,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,这正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体现。看待服务业的贡献,不能只看短期的经济数据,更要看到其在优化产业结构、促进就业、拉动消费、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长期价值。

## 展望“十五五”:全要素生产率需要“跑”多快?

证券时报记者:结合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,“十五五”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是多少?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需要达到什么水平?

刘俏:2035年我国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,测算下来未来10年经济年均增速需要达到约4.7%。“十五五”作为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,经济增速目标大概率在4.5%左右,这一目标既务实稳健,也能为“十六五”时期留出合理空间。要支撑4.5%左右的经济增速,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拉动力,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需要提升至40%左右,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。

这意味着经济增长要从过去的“要素驱动为主”转变为“效率驱动为主”。从年均增速来看,“十四五”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约1.8%,这一水平支撑“十五五”时期4.5%的经济增速仍有缺口,需要保持并稳步提升,确保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稳定在1.8%及以上,才能有效对冲资本边际效率递减、劳动要素贡献度下降带来的压力。

这一要求看似是数字的提升,实则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。过去经济增长中,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贡献占比偏高,而“十五五”时期,需要让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成为第一拉动力,这就要求研发投入效率进一步提升、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优化、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,让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增长目标同步、同频。

证券时报记者:从当前的发展基础来看,我国能否实现这一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目标?支撑这一目标的底气在哪里?

刘俏:从当前的发展基础和实践效果来看,实现这一目标是具备坚实基础和现实可能的,核心底气来自四个方面:

一是研发投入的规模优势和结构优化的趋势。我国研发投入已位居全球第二,基础研究占比虽偏低,但呈现稳步提升的趋势,科技创新的“家底”越来越厚,为技术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二是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配套能力。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,能快速将技术

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,在“1到N”的产业化环节具备独特优势,这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。

三是改革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。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、扩大高水平开放,打破体制机制障碍,能释放大量的效率空间,比如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、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,都能让生产要素流向效率更高的领域。

四是人力资本的积累。我国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持续提升,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,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支撑。从实践来看,“十四五”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,已经验证了我国推动创新驱动、效率驱动的有效性,只要持续坚持这一方向,“十五五”时期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是完全可能的。

证券时报记者: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,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和挑战?

刘俏:当前我们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测算和预期,都是基于线性的经济发展规律和稳定的外部环境,但在未来发展中,需要警惕双方

面的风险和挑战:一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。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,美伊冲突等可能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,甚至引发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,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也会增加外部环境的复杂性,如果出现重大的外部突发事件,会让线性的预期变得脆弱,甚至影响经济发展的整体节奏。二是内部的结构性问题。部分领域仍存在重复投资、产能过剩、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等问题,个别地方仍存在“重数量、轻质量”的政绩观,如果出现问题,会制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。

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,我们的核心应对策略就是“做好自己的事”。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,我们无法左右,但可以通过提升自身的发展韧性、完善自身的产业体系、深化自身的改革创新,增强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。只要坚定不移地培育新质生产力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、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,把自身的事情做好,就能以自身的稳定发展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。

## 制度改革如何打通效率提升的堵点?

证券时报记者:“十五五”时期,国家层面应如何引导、确保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?

刘俏:要让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同步,核心是推动发展方式从“重投入、轻效率”向“重质量、重效率”转变,国家层面的引导要聚焦“优化资源配置、强化创新驱动、完善体制机制”三大核心,把握好三个关键方向:一是平衡好科技创新前沿领域和传统产业升级的关系。既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、未来产业的研发投入,培育新质生产力,也要通过技术赋能推动传统农业、制造业、服务业的效率提升。不能只盯着“高大上”的领域,而忽视了传统产业的效率潜力。

二是平衡好生产、分配、交换、消费四个环节的投资。过去我们过于强调生产环节的投资,制造业、房地产等领域投入偏高,而分配、交

换、消费环节的投资不足,未来要加大对分配环节的收入调节,交换环节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,消费环节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,让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相统一。

三是平衡好“投资于物”和“投资于人”的关系。未来要把“投资于人”放在首要位置,加大对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人力资本的投入,提升劳动人口的素质和能力,这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核心人力资本支撑。

证券时报记者:结合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目标,您认为最紧迫的制度性改革是什么?应从哪些方面发力?

刘俏:“十五五”时期最紧迫的制度性改革,是围绕分配、交换、消费环节,破除制约效率提升和民生改善的体制机制障碍,核心聚焦四大领域:

一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。这是扩大内需、推动消费升级的核心,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。要通过一次分配向劳动者倾斜、二次分配加大转移支付力度、三次分配引导慈善捐赠,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,尤其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,比如提高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等。

二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。保

障农民的土地权益,让农民能通过土地流转、退出获得合理的财产性收入,消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,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。

三是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。适当增加地方政府的财力,推动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。同时,通过国债发行、债务置换等方式,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,引导地方政府树立正确的政绩观,把工作重心放在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上。

此外,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改革也至关重要。要提升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能力,让金融资源低成本流向科技创新、中小企业、绿色发展等关键领域,打破国企和大企业的金融资源垄断,进一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。

证券时报记者:当前部分企业面临“内卷式”竞争和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问题,导致投资意愿下降,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,应如何通过财税政策和金融支持,将研发投入转化为有效的资本形成?

刘俏:企业的“内卷式”竞争本质上是低水平的价格竞争和同质化竞争,核心原因是研发投入不足、创新能力偏弱,只能在存量市场中相互挤压。要将研发投入转化为有效的资本形成,财税政策和金融支持需要形成“组合拳”,

核心聚焦三个方面:

一是财税政策要加大对研发投入的激励力度。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、税收减免等政策,降低企业研发成本,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研发投入,同时对低水平重复投资、产能过剩领域实施税收约束,引导企业向高质量、创新型发展转型。

二是金融政策要强化对科技创新的精准支持。完善科技金融体系,发展创业投资、天使投资,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,同时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研发的信贷支持,推出知识产权质押、科技信用贷款等金融产品,解决企业研发的融资难题。

三是破除“内卷式”竞争的体制机制基础。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,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,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,让企业敢于投入研发、愿意投入研发,同时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开展差异化竞争、协同创新,推动产业集群发展,提升产业整体的创新能力和产能利用率。